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著 董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德] 哈尔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 著 董璐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49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德)罗萨(Rosa, H.)著;董璐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301-26518-5

I. ①加… II. ①罗… ②董… III. ①时间—管理—研究 IV. ①C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9387号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

书 名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Jiasu: Xiandai Shehui zhong Shijian Jiegou de Gaibian

著作责任者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著 董璐译

责任编辑 武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51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开本 27.5印张 449千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译序

“什么是时间？在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一旦要我对这个问题加以回答，我却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了。”古代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汀留下过这样一段关于时间的隽语。的确，“时间”这个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简明清晰、不会引起争议的定義，在哲学、社会学层面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它至今仍然是混沌模糊的语义存在，远没有能够达成一种基本概念上的共识。

从超验世界回到经验世界，情况似乎可以变得简单一些。一般来说，时间可以是指一种有明确单一指向、不可逆的序列过程；也可以是充当衡量世间万物循环、各种变化的基本等价物、计量单位；最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它被当做一种不言自明的变量，广泛地用于日常生活当中。

在古代社会、人类文明的早期，日晷和沙漏已经成为经典的时间测量工具，通过漏斗中一定数量的沙子，或者指针影子移动的一段距离，所对应、指代的实际上是被分割、区隔化了的万物、世事变化，其起衡量作用的目标范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从日晷、沙漏到今天的钟表、日历和各种电子数据，测量的工具、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功能、原理基础一如既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万物生命无休无止的循环往复，带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的不同过程，这些过程连接成有明确固定的先后顺序的、不可逆的动态发展链条，而用来指代、描述这种先后顺序、发展链条的基本工具，仍然是“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和“变化”是相伴相生的，变化赋予时间存在的意义，时间则成为变化的影子。而在时间的映射下，变化又是可以按照一定标准进一步分类并加以比较的，于是就有了“速度”的产生，而“速度”作为“时间”附属的一个次级概念，忠实地服务于“时间”和“变化”……

2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无论时间的内涵世界接下来怎样繁衍、扩张,可以说,它都是人类意识的产物,是人类思想活动的投射、结晶。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万物灵长,人类始终是运用自己遥遥领先于其他物种的脑力活动,对所处的世界加以观察、认识、判断和定义。时间不同于其他很多概念下的所指,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独立有形的客观实体,它是人类历经长期实践发现并定义的一种动态变化的逻辑关系集成,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飘忽于主观、客观之间的存在。

人类创造出时间这一工具,服务于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和认知。时间的概念内涵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并且在经由历史传承下来的精神、知识领域里,逐渐形成强大的动态的观念力量,反作用于外在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

现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时间哲学、时间社会学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丰富多彩。从中稍加搜寻采择所得,相信就应该远胜上述几点肤浅的个人体会。《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这本书,就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切入角度,展现了颇为系统深入的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时间不够用,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啧有烦言。无数这样的现象经过严谨系统的观察、测量和总结概括,其蕴含的意义内容已经足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证明人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加速的社会、加速的时代。

当然,这里所谓的加速,表面上最终仍然是基于自主选择背景下人们的个体感觉。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单位时间的使用效率,但是并没有因此通过时间的节省而释放、缓解人们的压力。因为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丰富了人们单位时间的选择机会。日新月异的生活标准和活动规范,刺激、迫使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持续、持久地加入到对周围各种资源的追求与攫取过程。对加速一时间匮乏的恐惧,恰恰来源于人们时间观念的改变,来源于改变的时间观念下日益增长的选择压力。

无奈之中憧憬“慢生活”的人们,经常会把海边那个贫穷的渔民和成功企业家的故事挂在嘴边。故事当中,看不惯渔夫的懒散和不求上进,企业家好心为渔夫制定、描绘了科学的奋斗计划和美好的生活愿景——最终事业发达后的渔夫将可以整日在沙滩上晒着太阳悠闲地垂钓。而渔夫的回答是,他现在已经在那样(整日在沙滩上晒着太阳悠闲

地垂钓)做了,不需要再经历企业家所建议的那么复杂、辛苦的过程去争取。

这个经典的“励志”故事,在《加速》一书的作者笔下,却有另外一种有趣而又完全不同的意味深长的释义。他借此邀请读者们进入到他所精心构建的一个激荡、自由的充满创造性的思维世界里。

当然,读者也可以选择拒绝这一邀请——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去思考时间的话。

董 璐

2014年5月于美国 Marietta

序 言

以前,也就是各种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时代,来自好时机市(Kairos)的宽容先生(Langmut)要向他住在时期市(Chronos)——这个地方正好在乌泰姆普斯帝国(Utempus)里(当时正值人们还无法明确辨析希腊语词素和拉丁语词素的时期)——的朋友消遣先生(Kurzweil)传递一条讯息的话,他必须要辛辛苦苦地走到朋友那里去,这大概需要六个小时,或者他也可以骑着毛驴去,那么这段路也至少要花上三个小时。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他彻彻底底地陷入时间紧张当中去,因为如果他不能在午饭前往返的话,或者说午饭前才动身、因而不得不在时期市过夜的话,他不仅不可避免地会与他老婆吵架,而且也损失了一个工作日。但是,在今天的话,宽容先生只要笑眯眯地拿起电话,把消息告诉消遣先生就可以了,并且他们还可以聊会儿天气;之后,他可以优哉游哉地吹着口哨,把猫喂了;接着再工作半个小时;接下来就可以和他的老婆一起准备午饭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使用微波炉。

当然了,在这个时候的工作也与之前的完全不同了。在科技没有被使用之前,宽容先生作为市政府抄写员,整天整天地忙于将书籍复写的工作。如果一本书很厚的话,有时他晚上也要继续抄写。但是,今天却完全不一样了,他只要在早上安安心心地打开复印机,然后喝上一杯咖啡,等复印机预热好了,就将模本完全根据好时机市的需要复印上10份或20份就可以了,而这些连20分钟的时间都用不了。之后,宽容先生可以去海边游泳。至于下午,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

于是,宽容先生应该终于有时间,坐在庭院里和他的老婆闲聊了,或者弹奏乐器,或是进行哲学思考,要么还可以读一读复印好的书籍,一切全凭他的兴趣。因为完全不用过时间紧张或有期限压力的生活而带来的喜悦简直是妙极了。宽容先生想要有一张他老婆的,或者他的猫的,或是海上日落的图片,于是他的曾孙子一听到这个愿望,就立即从房间

里拿来了他的数码相机,悠闲地按下了快门,之后,一眨眼的工夫,非常逼真的图片从打印机里印出来了;而不需要宽容先生再像以前那样去雇请他那个画家朋友永远先生,花上一个小时用画笔来做画了,那个时候,因为永远先生忙于作画,宽容先生还要花时间或是用各种手段讨好小猫或是用武力威胁小猫而让它保持静止不动。但是,现在,宽容先生却很少感觉到让什么东西定格为画面、从而之后可以慢慢欣赏或者传给后世的愿望了。

现在,如果夜晚时分户外有些寒凉、想让室内舒适温暖的话,宽容先生并不需要再跑到树林里去捡拾树枝,然后回到家中费劲地将它们点燃、感受到有限时间的温暖了。他只要简简单单地拧开暖气,这个装置是与海边的风车联系在一起的,完全是反掌之间就能让房间里变得像初夏的午后一样暖洋洋的。宽容先生很快乐,同时他觉得自己是富有的——因为他赢得了时间,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间,而且,不同寻常的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总被无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折磨着了。正如前人说的那样,宽容先生终于找到了闲情逸致。充沛富裕的时间、无尽的时间财富使宽容先生脱胎换骨成一个新人了,乌泰姆普斯帝国也成了另一个社会。

这就是或者类似于我们所设想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直到20世纪都一直是有关科学的预言所梦想的一个能够变成现实的美梦;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时间紧缺所带来的束缚和忙乱都不再存在;这个世界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并且因此可资利用的财富从短缺转而变为充裕。

现代科学的和经济的效率恰好可以产生出一个“乌泰姆普斯式”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一种从不被经济—技术进步的倡导者所怀疑的信仰,比如我们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身上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信念。^[1]“我们一直期待着(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本书作者注)经济上的富裕,并由此获得有益的结果,即让人们过上宁静而和谐

* 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总理。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之一,他与威廉·勒普克等经济部副部长,对联邦德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大。但艾哈德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经济的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奇迹,联邦德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艾哈德1957年出版了《大众的福利》(Wohlstand für alle),根据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改革的经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奠基人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译者注

[1] 参照 Erhard 1997 年。

的生活,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伯伦斯坦·林德(Staffan B. Linder)*因此中肯地作出了这样的评论。〔2〕而且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在他1932年所著的《悠闲颂》(Lob des Müßiggangs)中表达了对这样的观点的支持,即世外桃源——乌泰姆普斯式的社会基本上已经变成现实了;只是一种不明智的(“新教徒式的”)职业伦理以及对工作的错误的分配而使其没有被完全实现。〔3〕包括1964年美国的《生活》杂志(Life)也请人们对现代社会中将要出现的大量的时间富裕加以警惕,因为这会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因而在这一年2月21日出版的那期杂志的大标题就是:《美国人现在面临着过多的休闲:当务之急是如何过安逸的生活》。〔4〕

从很多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社会都与乌泰姆普斯式的城市好时机市有相同的地方——当然,另一方面,当今的社会与那时相比也有根本不同之处。为什么呢?“生活节奏已经大大加快”,并且由此带来了紧张、忙乱和时间紧张,因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抱怨:尽管正如生活在好时机市那里的人一样,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都在技术的辅助下,通过提高速度而赢得了大量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哪怕我们赢得了时间的富足。这本书正是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的这个巨大的佯谬,并且探明当代社会的隐秘的线索的。

为此,这项工作的关键就是解码社会加速中的逻辑。首先,从前文的开场故事中,人们很容易有这样的猜想,宽容先生正是通过他赢得时间的方法,又失去了时间:的确在复印机、照相机和暖气的帮助下,他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先被生产出来并且赚钱买回来。由此可以想到,即便生活在好时机市也需要参加到分工明确的生产劳动中去,因此宽容先生在复印技术被“发明”了之后,相应地要复制比之前更

* 斯戴芬·林德(1931—2000),瑞典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忙碌的休闲阶层》《论贸易和转化》等。——译者注

〔2〕 Linder,1970年,第1页。

**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他与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罗素的著作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译者注

〔3〕 Russell,1935年。

〔4〕 引自Putnam,1997年,第Ⅻ页。

多的书籍(当然,其前提是在乌泰姆普斯帝国的人们对书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在这种方式下,时间预算与技术带来的新希望之间所展开的是一个零和游戏(甚至是一场负和游戏):乌泰姆普斯帝国的居民需要与他们所节省的时间一样多的——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并使自己买得起那些能够节省时间的机器。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在许多地方流传的、版本各有不同的那个有关一位贫穷的渔夫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的故事。^[5]

在南部欧洲一个偏远的海边渔村,一位渔民坐在平坦的沙滩上,正用一副老旧的传统的鱼竿在钓鱼。一位富有的企业家在海边享受着他的孤寂的假期,此时正好散步走到渔夫身边,他观察了渔夫一会儿,然后摇着头,开始与渔夫攀谈。富翁问渔夫为什么在这里钓鱼,如果他去岩石陡峭的外海域去钓鱼,那会有双倍的收获。渔夫奇怪地看了富翁一眼,然后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样可以多钓到的鱼拿到附近城市的市场上去卖,然后就可以用卖鱼的收入去买一副新的玻璃纤维的钓鱼竿,而且也可以买得起对鱼更有吸引力的特殊的鱼饵。这样的话,每天所捕获的鱼的量轻轻松松地就可以翻番。”

“那么,然后呢?”渔夫更加不解地问道。变得有些不耐烦的企业家回答说,之后渔夫很快就可以买一艘小船了,他可以开着船去深海域,在那里可以捕获超出现在十倍的鱼;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可以富起来,于是他便买得起远洋拖网的渔船啦!企业家说到这里又变得神采奕奕,因他所描述的愿景而感到兴奋。“没错,”渔夫说,“那么之后我干什么呢?”企业家立即沉醉地描述道,那之后,渔夫就可以控制这里的整个海岸的捕捞了,因为会有整整一支捕捞船队为他工作。“啊哈,”渔夫回答说,“那么当他们为我工作时,我又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渔夫就可以整日里坐在平坦的沙滩上,享受着阳光,悠闲地垂钓了。“是啊,”渔夫说:“我现在就已经在这样做了。”

当然,这个故事其实相当幼稚。因为这个故事所展现的是一个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奋斗历史后最不可能的一个结局——企业家竭力使渔夫感兴趣的竟是与他现在状况一样的奋斗结果;因此,对于渔夫来说,如果按照企业家描绘的那样去做,尽管他应该能够获得成功,但是却什

[5] 这个故事最有名的版本应该是出现在海恩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63年)的《工作伦理堕落轶事》(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一书中的版本。

么也没有得到。所以这里的企业家显然正是罗素所诟病的“新教工作伦理的”牺牲品：工作本身对于这位企业家来说就是目的，从出发的起点到达最终结果之间的道路正是一场零和游戏——这还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但是，现实中的这类故事当然不是一场循环：开端和终点只是看起来一样，而事实上却大相径庭。那位渔民必须打鱼，因为他借此来维持生计，并且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位富裕的企业家可以垂钓，同时他也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事情可以去做。因此，可能性范围的扩大正是“加速所带来的希望”的重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沙滩边钓鱼的性质也因而发生了改变。企业家知道，因为钓鱼，他错过了在这个时间可以去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比如乘船出海、高尔夫球场的开张、驾车去下一个风景名胜……企业家可能因为这些选项的存在，而使得他的垂钓的闲情雅致被打扰，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似曾相识的，当然这也是愚蠢至极的——因为害怕错过什么，而使得人们无法投身于切切实实地“在那个世界存在”，也就是在那里可以做一名（理想状态下的）渔夫。

但是，企业家的这种对于害怕错过什么的恐惧并不只是出于享乐主义的根源，也有相当多的来自商业经营方面的原因。

当企业家在沙滩上垂钓时，他的竞争对手正在开发着新的、性能更好的船只；购得更广泛的捕鱼权利；使得企业家在海岸上的垄断变得有争议，因而使他不再能安心地坐在沙滩边钓鱼了。同时，他的公司的医疗保险、电话通讯和电力能源等费用，以及他的家庭的花费也都发生着变化，同样，他的资产管理所处的投资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也许他在最好的时刻都为这些而操心，而不是忘情地投入于垂钓中去——否则的话，明天他可能就不能钓鱼了。他也迫切地需要一身新衣服，因为他穿在身上的衣服是两年前的；而且，他戴的太阳镜也已经不符合最新的防护紫外线的标准了，因而不利于健康的。他的朋友们总是不断地搬家，因此也许他最好应该开车回家，在与他们失去联系之前，打电话给他们。总之，现在休假中的他总算有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了。另外，他的妻子近来总是很晚才回家，也许她正打算着离开他。不，当他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他绝不应该继续坐在沙滩上钓鱼（该死的，与此同时，他的电脑也太旧了，因而无法安装最新的软件，他也就无法在这些软件的帮助下管理地址。不断地一项一项逐条记录邮政地址、电话、手机和传真号码以及电子邮件地址的变化实在是太辛苦了。地址簿也因为不断地被涂改，变得面目不清而无法阅读，而

且都快被翻烂了)。

当这位企业家坐在沙滩边,打算享受垂钓的乐趣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正处在一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条,迅速下滑的斜坡上,或者是正站在向下开动的自动扶梯上,因此,他最好应该参加到竞赛当中,从而保证自己的位置,保证始终能了解最新情况。这不仅是“加速所带来的希望”驱使着他不断地加快着他的生活节奏,而且也由于他所处的技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高度动态性、这些环境的复杂性和随机性的不断增强,这些都迫使这位企业家处于不断的升级换代之中。因此,在这里也体现出渔夫寓言故事中的第二个回答的幼稚之处:富裕的企业家是不能像贫穷的渔夫那样只是必须去钓鱼的;尽管他可以有意识地拿出一些“额外的时间”,利用两三天到一周的时间在沙滩上(关掉手机、不接收电子邮件、不看电视地)“享受”,但是他会将这种驻留在“放慢速度的绿洲”——在这里他的所作所为和贫穷的渔夫一样——当做是非常罕见的奢侈,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因而当他回去之后,他必须追赶上去,或者是接受被落下来的状态。这样的意识明确表明,不仅是故事开头时的社会环境到了结尾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就连这位垂钓的企业家本人的特性也发生了改变。他将“在那时的”发展的终点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出发的起点。他对未来、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位企业家的未来的世界与他的过去的世界截然不同,而对于渔夫来说(与第一个故事中的宽容先生相似),他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打算他的未来。因此渔夫的期望范畴与经验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但对于企业家来说,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企业家对时间的流逝有着不同的感受,对于时间的价值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14 如果我们的主人公表现得和传统的企业家的形象(也包括企业家的各种算计考虑)一样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时间非常紧缺。他会努力保持对自己的生活和企业(以及对他来说重要的社会变化)的控制,而且会对未来的发展进行精心的计划。他的周围环境越是动态多变,他的事务链和可能性的范畴越是复杂和随机,他对未来的设计就越不能实现。因此,我们的这位企业家可能会继续发生转变:他放弃了对控制和操纵的要求,而转变为“赌徒”,跟随事件随波逐流。如果后天竞争对手将我的船只弄得一钱不值,那我可能就会去开个赌场,或者写本书,也许远赴印度去寻找我的精神领袖,也可能我将开始读大学。谁知道呢。这些都不需要我今天来做决定,到底做什么要看我

后天的感觉和那个时候我有哪些机会。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可能性。

这样的话,这位企业家有时又和那位渔夫一样了,也就是不用尝试着有计划地、长远地改变未来了。也许,他甚至又可以赢回一些休闲的时间了。但是,赌徒的周围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期望范畴与经验领域是分离的。因此,(后现代社会的)赌徒从另一种方式上来说,在那时和在那地就不仅是(前现代社会的)渔夫,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企业家。

我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描述我们在此地此景的存在的方式和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关于“我们想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与“我们如何打发我们的时间”这一问题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的”时间的质量、它的范畴和结构、它的速度和节奏都不归——或者只在非常小的程度上归我们支配。时间结构具有集合属性、社会性特征;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时间结构总是与行动中的个体对着干。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过程和事件的加速是现代社会的的基本原则。正如前面所讲述的两则故事所阐明的,这个基本原则的原因和作用方式是极其多元化而复杂的,间或相互矛盾。可以看到,故事中的主角事实上并不是面对一种类型的加速,而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加速:他们首先要应对技术上的加速,但是正如在好时机市的故事中所描绘的,从抽象逻辑的角度来观察,技术上的加速所带来的后果是生活节奏的减速。事实上,生活节奏的加速展示了由于技术上的加速所带来的社会的加速的似是而非的形式,这种矛盾在上文中对那位企业家的困境所做的思索中有所体现;并且这种似是而非很可能与第三种也可以独立分析的加速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加速和文化的变化速度,尽管可以对它们从表现形式上做单独的分析。我在本书中将展示,这几种加速的形式复杂的共同作用机制,是要为人们梦寐以求的乌泰姆普斯式的时间富足的状态,却被现实中的西方社会的极大的且不断加剧的时间紧缺的状态所代替负责的;时间危机,正在挑战传统的形式、个体所拥有的机会以及政治家的构建社会的能力,并且正不断让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危机时代的感知扩散,这种感觉是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蔓延的,也就是在“加速的社会中”,在社会结构、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持续地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却是结构上和文化上的深层次的静止,即历史的根本的凝滞,在这样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重要的元素再有任何改变,迅速变化的一直只是表

面现象。因而与新的、变化了的时间结构相适应的定位模式和社会政治安排都是值得思索的,在这本书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理论就是,这一切都是以现代社会的最深层的伦理和政治的信念为代价的,也是以(因此破产了的)“现代社会的项目”为代价的。

16 而为了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而撰写论文,以及之后将它完善成书稿,在很多方面也恰恰都是一个与时间、与钟表做斗争的过程。最终,如我所愿,这本书的能够令人接受的终稿完成了,为此我有许多朋友、建议提供者、商讨对象和陪伴者值得去感谢,他们在这些年里为我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对这本书的优点作出了不凡的贡献——而对于这本书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当然应该由我全部负责。我首先想要提到的是身为专家的汉斯·约阿希姆·吉戈尔(Hans-Joachim Giegel)*、克劳斯·迪克(Klaus Dicke)**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同时他们也是我可以与之讨论的伙伴、批判家,他们从三个完全不同的学科角度帮助我不断清晰我的论点,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鼓励、在错误面前给予我提醒。同样地也要感谢赫尔弗里德·默克勒(Herfried Münkler)****,他尤其是在这项工作的早期阶段对于框架的建立和梳理有着不可低估的帮助,并且在他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坛。

我从太多的同事那里获得了有教益的建议和启发,而我恐怕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不得不提及纽约新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Graduate Faculty der New School University in New York*),由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所慷慨资助的佛欧多尔·吕南科研究奖学金(Feodor-Lynen-Forschungsstipendium),我得以从2001年9月到2002年8月在那里(与国际政治事件隔绝开来而)不

* 汉斯·约阿希姆·吉戈尔,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理论》《工业劳动与自作主张》等。——译者注

** 克劳斯·迪克(1953—),德国政治学家,曾任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校长。主要著作有《人权与欧洲一体化》《国际组织的效率与效用》《人权与发展》等。——译者注

*** 阿克塞尔·霍耐特(194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嫡传弟子;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关键人物。主要著作有《权力的批判》《支离破碎的社会》《不确定性的痛苦——读斯宾诺莎》《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等。——译者注

**** 赫尔弗里德·默克勒(1951—),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公正的概念》《帝国:从古罗马到美国的世界统治的逻辑》和《关于战争》等。——译者注

受打扰地完成这部作品。安德鲁·阿洛托(Andrew Arato)、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南茜·弗瑞泽(Nancy Fraser)都是我特别感谢的人。威廉姆·E.绍伊尔曼(William Scheuerman)*由于与我有着相近的研究主题,因而成为我的非常重要的谈话对象,并且也是好朋友。这番感谢同样适用于曼弗雷德·伽哈玛(Manfred Garhammer)**。我也从汉斯-乔治·布鲁斯(Hanns-Georg Brose)***、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和马丁·科利(Martin Kohli)*那里得到了关键的专业上的帮助。我还想感谢我在耶拿(Jena)的同事米歇尔·比兹(Michael Beetz)、米歇尔·贝尔(Michael Behr)、罗宾·凯利凯茨(Robin Celikates)、克劳兹-M.科达尔(Klaus-M. Kodalle)、约恩·拉姆拉(Jörn Lamla)、卢兹·尼塔玛(Lutz Niethammer)、迈克·山德勃斯(Mike Sandbothe)、瑞恩·崔泼托(Rainer Treptow),还有罗尔夫·施拉德(Ralph Schrader)和安德烈·考特曼(Andrea Kottmann)。在所有专业领域的决定中,对我来说不可或缺的一位咨询者就是安卓·凯撒(Andre Kaiser)。除了洪堡基金之外,我也要感谢克尔伯基金会(Körber-Stiftung)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支持和不凡的合作。

在与斯蒂芬·阿曼(Stefan Amann)、约克·阿奈克(Jörn Arnecke)、伊丽莎白特·赫尔曼(Elisabeth Herrmann)、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克里斯汀·克劳斯(Christian Kraus)、卡罗拉·拉什(Carola Lasch)、保鲁斯·里宁(Paulus Liening)、斯特芬·茨姆曼(Stephan Zimmermann)和弗瑞德·魏茨(Frieder Weis)非常愉快的谈话中,我深受启发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想法;也有一些见解是在与TC Grafenhausen的对手网球场(Gegners Tennisplätzen)上的年轻人共同度过的许多个星期天中所获得的;还有来自于从1998年到2003年在与布伦瑞克(Braun-

* 威廉姆·E.绍伊尔曼(William E. Scheuerman)(1965—),英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围困中的法律规则》《法律的终结》《加速的社会》(与本书作者合著)等。——译者注

** 曼弗雷德·伽哈玛,德国社会学者、社会工作教授。主要著作有《远程工作与远程通讯》《欧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平衡时间:弹性工作制对日常生活、休闲和家庭的影响》。——译者注

*** 汉斯·乔治·布鲁斯(1945—),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工作体验》《个体的终结到没有尽头的个人化》《不同性的文化》等。——译者注

**** 芭芭拉·亚当,英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时间》(Time)等。——译者注

* 马丁·科利(1942—),瑞士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欧洲社会的融入与排斥》《欧洲还在运转吗:整合、雇佣和社会秩序》《制度化的生命历程》等。——译者注

schweig)的德国学生会(Deutsche Schüler Akademie)热情的成员的激烈讨论中。大学生助理海克·斯泰尼格(Heiko Steiniger)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相关文献的查阅。乌苏拉·麦恩乌西(Ursula Maynvshi)女士对整部书稿进行了极其细致的阅读,并且明察秋毫般地发现了一些错误并作出修正,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伯恩德·斯蒂格勒(Bernd Stiegler)也是如此,对于两位我必须表达自己浓浓的谢意。

我希望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兄弟姐妹:阿明(Armin)和克里斯汀(Christine)。